

· 移植伦理 ·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的伦理研究

胡潇楠 吕任婕 王临英 孟焯湘 崔瑜 燕娟

【摘要】 近年来,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激励政策。为保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公正、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原则,梳理我国当前在实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精神激励缺乏持续性心理干预、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等,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精神激励;经济激励;公正原则;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

【中图分类号】 R617.R-0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45(2024)03-0018-07

Ethical research of incentive policie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Hu Xiaonan*, Lyu Renjie, Wang Linying, Meng Yexiang, Cui Yu, Yan 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 Juan, Email: yanjuan@sxmu.edu.c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and transplantatio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have successively released incentive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rgan donors after citizen's death and their families, current status of incentive policie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was illustrat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Combining with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respect for autonomy, nonmaleficence and beneficenc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centive policie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were identified in China, such as lack of continuou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spiritual incentives,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practice and the impact of indirect economic incentives on individual donation autonomy, etc.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at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individual level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policie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 don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Organ transplantation; Spiritual incentive; Economic incentive; Justice; Respect for autonomy; Nonmaleficence; Beneficence

器官移植技术是 20 世纪生命医学科学的一项重大进展,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医疗手段,挽救了众多器官衰竭患者^[1]。移植的前提是捐献,没有

捐献就没有移植。2010 年原国家卫生部同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公民逝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4012

基金项目: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GH-21196)

作者单位:030001 太原,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胡潇楠、吕任婕、王临英、孟焯湘、崔瑜、燕娟);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山西白求恩医院 山西医学科学院 同济山西医院(王临英)

作者简介:胡潇楠(ORCID 0009-0003-4424-9561),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医学伦理学,Email: hxn13073@163.com

通信作者:燕娟(ORCID 0009-0001-6078-6020),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伦理学,Email: yanjuan@sxmu.edu.cn

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尸体器官移植捐献唯一来源。但由于传统文化、捐献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器官捐献率不高,截至2022年,我国百万人口捐献率为3.98^[2]。为了提高我国器官捐献率,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激励政策,如捐献者家属移植优先权、免除捐献者的丧葬费等,引起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目前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践中的激励政策,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以下简称“捐献激励”)政策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

1 我国捐献激励政策现状

2010年,原国家卫生部委托红十字会负责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的缅怀纪念、救助激励等工作。2022年,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关于建立对人体器官捐献者抚恤制度的建议》提出在捐献者去世之后,对捐献者生前在医保报销中个人承担部分给予全部返还,民政部门对于捐献者免费提供纪念墓地及免除火化等丧葬费用,对于家庭特别贫困的捐献者,通过财政补助、社会捐赠以及受益方定向捐赠等方式筹集基金^[3]。但由于文化、制度等原因,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实践对捐献激励政策提出了挑战。

目前学术界及实践中存在报销、补偿、支付与捐献激励等概念混淆问题,如将合理报销费用归为捐献激励。因此,在讨论捐献激励政策之前,首先要对捐献激励概念进行界定。报销是指因捐献事件而造成经济支出,将所造成的经济支出进行补给,如捐献者家属因捐献行为而造成的误工费、车补费、住宿费等。2021年国务院为促进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规定将器官捐献者家属相关成本主要包括器官捐献者家属在办理器官捐献事宜期间的交通、食宿、误工补贴等成本纳入器官获取组织的获取器官成本^[4],这说明从国家层面已经将交通、食宿、误工补贴归为报销。补偿则是指对他人造成损害而进行的金钱或物质给予。支付则含有“买卖”之嫌,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捐献激励是指基于公正回报理论,尊重及保护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通过一系列规范化激励政策表达对捐献者及其家属捐献行为的感谢、认可与鼓励。从目前已颁布的激励政策来看,可将激励政策分为精神激励、优先权激励和经济激励。

1.1 精神激励

为捐献者建立纪念碑,为捐献者家属颁发荣誉证书

书等精神激励方式已成为激励公民器官捐献的主要趋势。全国各地相继建立纪念碑、纪念园,为捐献者家属及社会人士提供纪念缅怀的场所。为捐献者家属颁发荣誉证书,进行人道主义关怀。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对《关于进一步规范人体器官捐献及移植管理的提案》的答复中提出“对捐献者家属精神和生活上关心,制作发放捐献证书,建立缅怀纪念制度等”意见^[5]。

1.2 优先权激励

优先权的激励政策在2013年被纳入到我国地方法律法规中,如《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规定人体器官捐献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或者兄弟姐妹等,在需要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时享有优先权。此外,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中规定,为鼓励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和捐献者家属在需要移植时,享有优先权,同一分配层级内,登记成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3年以上、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配偶以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在排序时将获得移植优先权^[6]。由此可见,优先权是通过“加分机制”来保障社会公平,也从根本上为捐献者及其家属的权益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1.3 经济激励

经济激励包括直接经济激励和间接经济激励。直接经济激励如直接给予现金等,间接经济激励包括免除捐献者丧葬费、为困难捐献者家庭提供人道救助等。为防止器官商业化,直接经济激励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对于间接经济激励,湖北省、重庆市等地区相继规定民政部门应当免除捐献者的基本丧葬费用^[7-8]。云南省、南京市等地区红十字会设立捐献救助基金,对已捐献人体器官的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提供必要的人道救助^[9-10]。

2 我国捐献激励政策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2.1 公正原则

任何一项政策或措施都应该坚持公正,对所有公民负责,任何一项技术的兴起都不能建立在违背公平的伦理原则之上^[11]。公正原则包括回报公正、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捐献激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体现了回报公正和程序公正。

赏罚公平是回报公正的核心,对于有利于社会的人要进行奖励,如为见义勇为的人颁发荣誉证书及奖

金以表示感谢与鼓励,对于危害社会的人就要进行惩处。儒家认为遵循天道,仁者爱人,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外在表现为道、仁、义、礼等社会行为规范,器官捐献是一项高尚、无私的大爱行为,器官捐献者捐出自己的器官,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实为仁者,理应得到感谢与认可。因此,在考虑捐献的器官作为生命的礼物的同时,也应当强调回报公正,为捐献者免除丧葬费、为捐献者家属提供移植优先权等。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应该向捐献者倾斜。

程序公正旨在保证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正当程序。国家及地方颁布了一系列的捐献激励政策,捐献激励政策的实施是公开透明的,每位捐献者及其家属有机会、有渠道获知相关信息,并对所有的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实施是一致的,捐献激励政策的实施具有无偏倚性和一致性,是符合程序公正原则的。

2.2 尊重自主原则

人是具有主体性的,不应该被剥削、被压迫,更不应该成为一种工具^[12]。尊重自主原则要求尊重个人自主性,自主性反映了个人的理念、信仰与价值。侵犯他人的自主性就是侵犯了他人的基本道德权利。

康德认为将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对待^[13-14]。所有理性存在都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内在于具有理性的存在,理性存在具有康德所说“自主的意志”。公民的自主性是个人文化素养与价值观的凝集,是不能受到侵犯的。尊重个人捐献自主性就是尊重公民的捐献意愿,捐献是自愿的,每个人都有与他人同等的内在价值,保障捐献者的意愿不受胁迫和诱导。人是具有理性的,人的自主性不能被胁迫与诱导,一旦人的自主性被侵犯,任何一项政策首先在伦理上是行不通的。

2.3 不伤害原则

儒家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目的是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对于难以避免的伤害,不伤害原则要求将对捐献者及其家属造成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化。

器官捐献者的离世,难免对捐献者家属造成身心伤害,如悲伤、失落等。在器官捐献过程中,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者对于捐献者家属进行帮助,表达对捐献行为的肯定,减轻捐献者家属心理遭受的伤害,让捐献者家属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有助于抚平创伤。针对不可避免的伤害,在不违背伦理原则的基础之上,将对捐献者及其家属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化,切实关怀捐

献者家属的身心健康。

2.4 有利原则

有利原则是指在不伤害原则的基础上切实为器官捐献者与受者谋利益,促进健康,增进幸福^[15]。有利原则要求政策制定促进捐献者及其家属健康,增进幸福,对受到的伤害施以干预,防止伤害进一步加深。人道救助是一种事后行为,是红十字会对困难捐献者家庭进行的帮扶,是从社会层面表达对捐献行为的肯定与鼓励。个性化的针对每个家庭的需求进行一定的救助,对未成年人的照顾、对老人的赡养等人道主义救助是符合有利原则的,提高捐献者家庭的自我认同感,抚平捐献者家属心灵的创伤,促进身心健康,提高幸福感,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

3 我国捐献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

通过梳理我国捐献激励政策,结合我国捐献激励政策的实施,发现在精神激励、人道救助实践过程以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他人的影响等方面存在巨大挑战,以下从这三方面分别来进行阐述。

3.1 精神激励缺乏延续性心理干预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分为五个部分,即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术后登记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16]。其中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包括精神激励、优先权激励和经济激励,目前精神激励体现的是对捐献者家属短期的人文关怀。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器官获取前的心理干预^[17-18],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者忽略了捐献者家属在捐献结束后不同阶段的心理变化,缺乏对捐献者家属的延续性心理干预,捐献者家属可能会产生内疚、悲伤的心理情绪,长时间走不出悲痛情绪^[19]。有研究调查显示,捐献结束后,捐献者家属希望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可,希望得到专业的心理干预措施^[20]。因此,专业人员对捐献者家属进行延续性心理干预,保障捐献者家属的身心健康是尤为重要的。

3.2 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包括捐献登记、捐献评估、捐献确认、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缅怀纪念、人道救助八个环节^[21]。由省红十字会设立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捐献者家属或代理人进行申请,省红十字会对困难捐献者家庭进行人道主义救助。人道救助是对困难群体进行困难帮扶、捐资助

学等工作, 而困难捐献者家庭属于困难群体的一部分, 理应对其进行人道救助, 但在实践过程中, 由于很难界定救助形式及时间, 如协调员在捐献确认环节就承诺给予人道救助, 造成只有捐献器官才会进行人道救助的曲解, 对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人群造成引诱, 出现以器官换取救助的尴尬局面, 影响社会公正。

3.3 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

对于间接经济激励的担忧主要在于间接经济激励的形式及额度是否会造成变相的引诱。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农村地区相较于城市, 经济发展、教育水平落后, 存在众多脆弱人群, 如没有劳动力或者无依无靠的人群可能会因为缺乏经济支撑或家庭关系而去选择器官捐献, 在这种情况下, 间接经济激励的形式及额度可能会影响到部分人群捐献自主性的表达^[22]。如免除捐献者丧葬费, 不同地区免除丧葬费的额度有待进一步讨论, 民政部门免除丧葬费的额度过低对公民起不到激励作用, 过高则会影响脆弱人群的捐献意愿, 削弱个人自主性的表达。

4 完善捐献激励政策的建议

4.1 政府监管, 统筹协调

加大对器官捐献工作的重视程度, 统筹协调, 完善捐献激励措施, 提升监管强度, 保障器官捐献事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23]。

首先,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完善精神激励措施。完善的捐献激励措施是捐献者及其家属权益的保障, 尤其精神方面的激励措施^[24]。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 国人讲究“逝者为大”, 重视器官获取后的遗体缅怀, 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及相关单位联合举办缅怀纪念活动, 对于抚慰捐献者家属心灵具有重要意义^[25]。建议各省级政府制定全方位的精神激励措施, 出台救助激励的纲领性文件, 建立具有政府性质的专业心理治疗机构, 组建心理专家团队, 专门负责捐献者家属的身心健康。由心理专家定期对捐献者家属进行心理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心理干预。此外, 由政府建立权威公共信息平台, 方便捐献者家属进行信息交流, 舒缓悲伤情绪, 减轻心理压力^[26]。

其次, 规范协调员的行为, 加强伦理考核。协调员作为与捐献者及其家属接触最为紧密的一员, 其言行举止会影响到捐献者及其家属。由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建立责任制度, 加强协调员的培训, 增加伦理考核, 细化每一个捐献流程, 规范器官获取流程, 严格

要求协调员的自身行为, 增加监督机制, 建立奖惩制度, 对违反伦理规范的进行惩罚。加强对协调员的专业知识训练, 提高协调员的素质水平及工作质量^[27]。由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增加公民反馈渠道, 建立投诉平台及拨打热线, 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

最后, 明确经济激励, 规定额度范围。目前我国规定的经济激励只是一个笼统的范围, 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各个地区文化水平、宗教信仰不一, 每个家庭情况不一, 救助数额是无法准确计算的, 全国统一救助数额是不切实际的^[28]。应由各省根据当地风土人情及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制定, 如各地民政部门结合当地人均收入水平确立免除捐献者丧葬费上限, 最大化地保障公民捐献意愿的自主性。

4.2 社会引导, 和谐互助

一项良好持久的政策或措施, 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驱动, 更应该让社会公众建立起对捐献激励的理性认知^[29], 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参与。

首先, 红十字会履行职责, 依法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国红十字章程》相继明确规定红十字会参与、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职责^[30-31]。由此可见, 红十字会在人体器官捐献领域是有明确职责的, 积极参与到人体器官捐献事业, 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加大在该领域的财政支出, 加大宣传力度, 拓宽宣传渠道, 联合高校、医院组织主题活动, 对捐献激励政策进行普及宣传, 配合政府进行捐献者家庭的心理救助。对捐献者及其家庭的救助激励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履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职责义务, 按照章程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其次, 鼓励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到器官捐献事业中。对于困难捐献者家庭的人道救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所确定的六大类公益活动标准^[32]。慈善组织可依法举办慈善活动, 面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募捐, 广泛吸纳企业和个人捐资, 联合创办公益基金, 为困难捐献者家庭提供个性化救助, 如为捐献者子女解决教育问题、帮助老人解决赡养问题等。

最后, 建立以街道社区为主体的基层组织进行社会公众宣传教育。有研究表明, 公民对器官捐献不了解是影响公民捐献意愿的重要因素^[33], 而社区工作者作为与公民接触最广泛、最被信任的群体, 加强基层组织责任感, 制作宣传手册, 免费发放给公民, 积极

举办纪念缅怀活动,开展宣传教育讲座等,提高公民对捐献激励相关知识的认知度,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促进公民捐献意愿的自主表达。

4.3 个人响应,以身作则

捐献激励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不仅要靠政府监管、社会引导,还需要个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提高个人对捐献激励政策的认知。

首先,社会大众是社会的基础和动力,鼓励社会大众学习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提高个人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积极参与各种组织活动,正确理解捐献激励政策的意义,主动表达个人捐献意愿。积极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中,针对国家及地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建议。在对于大学生器官捐献意愿的调查中,涉及捐献的负面新闻也会影响捐献决心^[34],因此在公民主动了解器官捐献相关知识时,应甄别各媒体信息,具备鉴别能力,建立起对捐献者及其家庭的尊敬之情,给予捐献者家庭安慰与尊重,正确看待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其次,更大发挥医疗机构、器官获取组织中工作人员,如人体器官捐献信息员、协调员的作用。其中协调员是和捐献者及其家属直接接触的工作人员,是一个政策的宣传者、沟通的执行人,应具备有效的沟通能力,提高共情能力,规范个人言行举止,增强自身捐献意愿,提高器官捐献协调效果,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35]。在与潜在捐献者家属进行交流时,建议大力弘扬器官捐献意义,避免提到捐献激励政策,以防影响捐献者家属的意愿表达,严格遵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履行自身职责。

最后,公众人物发挥榜样作用。公众人物集责任感与使命感于一身,充分发挥积极导向作用。建议各大主流媒体平台联合公众人物利用流量效应进行器官捐献的宣传,选取具有特殊意义的案例进行宣传报道,如叶沙“一个人的篮球队”等^[36],发挥正向积极导向作用。为慈善组织进行捐款捐物,以自身力量带动广大公民自身捐献意愿的表达,营造和谐友爱的社会氛围。此外有研究显示捐献意愿与公民接收到的信息有关^[37-38],因此以权威媒体为主进行器官捐献的宣传,以计划性、针对性地采取公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39],保障公民接收到的信息准确性。同时各媒体秉持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积极宣传器官捐献的意义,引导正向舆论,为器官捐献事业增砖添瓦。

5 小 结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率的逐年提升,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捐献激励政策的广泛关注。器官捐献是一项大爱行为,理应对该行为进行激励。从目前的捐献激励政策来看,仍面临巨大的挑战,国家及社会需加强对捐献激励政策的重视,加大对捐献激励政策的宣传力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激励体系。

参考文献:

- [1] 黄洁夫.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 [2] 目有繁星, 沐光而行 | 第七个中国器官捐献日主题活动在沪举办[EB/OL]. [2023-07-16]. <https://www.cotdf.org.cn/article/1451>.
- [3] 郑皓月.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建议建立“人体器官捐献抚恤制度”为捐献方多提供关怀[EB/OL]. [2023-01-16]. http://news.cnr.cn/dj/20220305/t20220305_525757777.shtml.
-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健委关于印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EB/OL]. [2023-01-30]. <https://www.codac.org.cn/contentdon/policy/20210901/131004435.html>.
-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0820号(医疗卫生类080号)提案答复的函[EB/OL]. [2023-01-16]. <http://www.nhc.gov.cn/wjw/tia/202209/896d022431f8468b905df7c653865c81.shtml>.
-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卫健委关于印发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的通知[EB/OL]. [2023-01-16]. <http://www.nhc.gov.cn/zyzygj/s3586/201808/d35d96f2db82403ebe2ba41f2c583896.shtml>.
- [7] 湖北省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 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EB/OL]. [2023-07-12]. <https://www.codac.org.cn/contentdon/locallaws/20141201/123002064.html>.
- [8] 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重庆市人体和遗体器官捐献条例[EB/OL]. [2023-07-12]. <https://www.codac.org.cn/contentdon/locallaws/20160501/91102067.html>.
- [9] 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云南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EB/OL]. [2023-07-12]. <https://www.codac.org.cn/contentdon/locallaws/20160301/10602066.html>.
- [10] 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南京市遗体器官捐献条例[EB/OL]. [2023-07-12]. <https://www.codac.org.cn/contentdon/locallaws/20151201/4202078.html>.
- [11] 于兰亦.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 伦理和政策研究[D]. 北京: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9.
- [12] 翟晓梅, 邱仁宗. 生命伦理学[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 2020: 28.
- [13] 李科政. 康德“人格中的人性”与目的自身——以科斯嘉德式的诠释为切入点的考察[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7(1): 117-123. DOI: 10.3969/j.issn.1001-4799.2020.01.015.

- LI KZ. Kant's "human nature in personality" and the purpose self: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gardian interpretation[J]. J Hubei Univ (Philos Soc Sci Edit), 2020, 47(1): 117-123. DOI: 10.3969/j.issn.1001-4799.2020.01.015.
- [14] 牛彬彬. 人体组织和器官捐献补偿的哲学思考[J]. 医学与哲学, 2023, 44(10): 44-47,51.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3.10.10.
NIU BB.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compensation for human tissue and organ donation[J]. Med Philos, 2023, 44(10): 44-47,51.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3.10.10.
- [15] 燕娟, 陈好雨, 周华, 等. 小肾癌活体供肾移植的伦理思考[J].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20, 41(12): 762-764. DOI: 10.3760/cma.j.cn421203-20200405-00108.
YAN J, CHEN HY, ZHOU H, et al. Ethical considerations on live 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for small renal cell carcinoma[J]. Chin J Organ Transplant, 2020, 41(12): 762-764. DOI: 10.3760/cma.j.cn421203-20200405-00108.
- [16] 黄洁夫, 叶启发. 建立中国模式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J].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7, 38(6): 861-865. DOI: 10.14188/j.1671-8852.2017.06.001.
HUANG JF, YE QF.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model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 system to provide high level ethical transplant services for the Chinese people[J]. Med J Wuhan Univ, 2017, 38(6): 861-865. DOI: 10.14188/j.1671-8852.2017.06.001.
- [17] 解雨, 雷蕾, 谢勤, 等. 器官捐献中劝捐协调过程的现状与思考[J]. 护理学报, 2021, 28(22): 40-44. DOI: 10.16460/j.issn1008-9969.2021.22.040.
XIE Y, LEI L, XIE Q, et al.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ordination process of encouraging donation in organ donation[J]. J Nurs (China), 2021, 28(22): 40-44. DOI: 10.16460/j.issn1008-9969.2021.22.040.
- [18] 张晓曼, 冯雷. 运用心理危机干预缓解中国器官捐献文化敏感性[J]. 器官移植, 2019, 10(1): 84-87.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9.01.013.
ZHANG XM, FENG L. Using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to alleviate the sensitivity of Chinese organ donation culture[J]. Organ transplant, 2019, 10(1): 84-87.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9.01.013.
- [19] 杨顺良, 黄丽婷, 谭建明. 器官捐献后的心理救助[J]. 器官移植, 2016, 7(2): 89-93.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6.02.002.
YANG SL, HUANG LT, TAN JM.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after organ donation[J]. Organ Transplant, 2016, 7(2): 89-93.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6.02.002.
- [20] 谢文照, 贺海燕, 邓渲桐, 等. 器官移植捐献者家属社会支持需求研究[J]. 医学与哲学, 2021, 42(22): 23-27.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1.22.05.
XIE WZ, HE HY, DENG XT, et al. Study on the social support needs of family members of organ donors[J]. Med Philos, 2021, 42(22): 23-27.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1.22.05.
- [21] 燕娟, 江文诗, 孙永康, 等.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思考与建议[J]. 医学与哲学, 2022, 43(2): 28-32.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2.0206.
YAN J, JIANG WS, SUN YK, et al.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ethical review of Chinese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J]. Med Philos, 2022, 43(2): 28-32.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2.0206.
- [22] 于兰亦, 邱仁宗, 翟晓梅.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的伦理学思考[J]. 医学与哲学, 2019, 40(10): 14-18,31.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19.10.04.
YU LY, QIU RZ, ZHAI XM. Ethical considerations on incentive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J]. Med Philos, 2019, 40(10): 14-18,31.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19.10.04.
- [23] 朱乃庚, 何重香.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影响因素分析[J]. 医学与哲学, 2020, 41(24): 27-30.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0.24.07.
ZHU NG, HE CX. Analysis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f organ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J]. Med Philos, 2020, 41(24):27-30.D0I:10.12014/j.issn.1002-0772.2020.24.07.
- [24] 吴冠华, 吴奇飞. 遗体器官捐献中悔捐现象分析及对策建议[J]. 医学与社会, 2020, 33(5): 129-134. DOI: 10.13723/j.yxysh.2020.05.027.
WU GH, WU QF.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onation revocation in deceased organ donation[J]. Med Soc, 2020, 33(5): 129-134. DOI: 10.13723/j.yxysh.2020.05.027.
- [25] 江文诗, 马联胜, 爻傲, 等. 多学科融合促进器官捐献学科体系建设及专业化发展[J]. 器官移植, 2022, 13(6): 711-721.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2.06.004.
JIANG WS, MA LS, SHU J,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romotes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organ donation[J]. Organ Transplant, 2022, 13(6): 711-721.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2.06.004.
- [26] 高汉, 王戎, 姜莉, 等. 论器官捐献中家属意愿的影响因素与对策[J]. 医学与哲学(A), 2016, 37(9): 45-48.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16.09a.13.
GAO H, WANG Y, JIANG L, et 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mily members' willingness for organ don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J]. Med Philos(A), 2016, 37(9):45-48.D0I:10.12014/j.issn.1002-0772.2016.09a.13.
- [27] 午建全, 商曼曼, 郑桂芳, 等. 基于洋葱模型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J]. 器官移植, 2023, 14(5): 714-722.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3100.
WU JQ, SHANG MM, ZHENG GF, et al. Construction of post competency model of human organ donation coordinators based on onion model[J]. Organ Transplant, 2023, 14(5): 714-722.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3100.
- [28] 杨顺良, 黄丽婷, 谭建明.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救助体系建立与实现途径的构想[J/OL].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 2015, 9(4): 151-154. DOI: 10.3877/cma.j.issn.1674-3903.2015.04.001.
YANG SL, HUANG LT, TAN JM. Conception on establishment and realization of organ donation assistance system in China[J/OL]. Chin J Transplant

- (Electr Edit), 2015, 9(4): 151-154. DOI: 10.3877/cma.j.issn.1674-3903.2015.04.001.
- [29] 唐健. 中国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改革的伦理评析[J/OL].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22, 10(1): 1-3. DOI: 10.3969/j.issn.2095-5332.2022.01.001.
TANG J. Ethical analysis of organ donation reform after the death of Chinese citizens[J/OL]. Pract J Organ Transplant (Electr Vers), 2022, 10(1): 1-3. DOI: 10.3969/j.issn.2095-5332.2022.01.001.
- [30] 全国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EB/OL]. [2023-07-09]. <https://www.codac.org.cn/contentdon/regulations/20170508/3802063.html>.
- [31]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EB/OL]. [2023-07-09]. <https://www.codac.org.cn/contentdon/regulations/20190903/3702917.html>.
- [32] 杨顺良. 慈善组织参与人体器官捐献者家庭困难救助的探索[J]. 器官移植, 2017, 8(1): 5-9.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7.01.002.
YANG SL. Exploration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family assistance for human organ donors in difficulties[J]. Organ Transplant, 2017, 8(1): 5-9.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7.01.002.
- [33] 孔杨, 任敬, 国航, 等. 对器官捐献不同态度居民的捐献意愿[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3, 37(11): 951-957.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23.11.007.
KONG Y, REN J, GUO H, et al. Organ donation willingness of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organ donation[J]. Chin Ment Health J, 2023, 37(11): 951-957.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23.11.007.
- [34] 阎茹, 邱鸿钟, 黄海. 大学生器官捐献意愿的文化心理特征[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18, 22(4): 600-605. DOI: 10.3969/j.issn.2095-4344.0097.
YAN R, QIU HZ, HUANG H. Wil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J]. Chin J Tissue Eng Res, 2018, 22(4): 600-605. DOI: 10.3969/j.issn.2095-4344.0097.
- [35] 侯晓丽, 国航, 任敬, 等. 器官捐献协调员劝捐协调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器官移植, 2023, 14(1): 120-127.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3.01.016.
HOU XL, GUO H, REN J, et al. Investigation on status 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donation coordination of organ donation coordinators[J]. Organ Transplant, 2023, 14(1): 120-127.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3.01.016.
- [36] 孙胜红, 吴若林, 朱乃庚, 等.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公民器官捐献意愿影响的研究进展[J]. 医学与哲学, 2020, 41(24): 23-26.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0.24.06.
SUN SH, WU RL, ZHU 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on the civil willingness towards organ donation[J]. Med Philos, 2020, 41(24): 23-26.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0.24.06.
- [37] 张永慧, 陈玉, 鲁静雅, 等. 器官捐献家属支持需求研究进展[J]. 医学与哲学, 2023, 44(10): 48-51.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3.10.11.
ZHANG YH, CHEN Y, LU JY,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family support needs for organ donation[J]. Med Philos, 2023, 44(10): 48-51.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3.10.11.
- [38] 国航, 侯晓丽, 任敬, 等. 基于 ABC 态度模型的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器官移植, 2022, 13(3): 378-384.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2.03.015.
GUO H, HOU XL, REN J, et a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gan donation willingness based on ABC attitude model[J]. Organ Transplant, 2022, 13(3): 378-384.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2.03.015.
- [39] 曹翠萍, 黄海. 构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社会宣教体系的思考[J]. 空军军医大学学报, 2016, 7(3): 63-65, 70. DOI: 10.13276/j.issn.1674-8913.2016.03.014.
CAO CP, HUANG H. Thoughts about constructing a social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system for organ donation in China[J]. J Air Force Med Univ, 2016, 7(3): 63-65, 70. DOI: 10.13276/j.issn.1674-8913.2016.03.014.

(收稿日期: 2023-12-21)

(本文编辑: 方引超 邬加佳)